



自的视角折射出沈从文复杂个性和丰富人生机遇的不同侧面,其间的是是非非都将在岁月的汰洗中或早或晚遁于无形,而人们对那些已然远逝的孤独灵魂的凝望与思索,则是持久而永恒的。

虽然沈从文尚有作为文物研究家和物质文化史专家而存在的一面,但他作为文学家的存在将更为历史所铭记。对于这一点,沈从文本人在创作伊始即怀着充分的自信,正如他在1934年1月18日致张兆和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当都市文明的浮躁与喧嚣逐渐潜入人类生存的每一寸领地,当人们只能去虚构的文本世界去寻求“诗意的栖居”的时候,沈从文笔下那个侠气与灵气并陈、集浑朴的粗犷与哀婉的诗意于一

体的湘西世界会越来越持久地牵系着人们的心灵。然而,即便如此,在欣赏与热爱其作品的数以万计的读者中,能够真正读懂并领悟到沈从文对于人性和人类生存的隐忧之感的,又能有几人呢?沈从文当年曾经说过:“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等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虽然告别了遭批判和被封杀的命运,沈从文作品在走向流行和大众的同时依旧隐含着另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和寂寞。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编者希望借助《沈从文评说八十年》的编选为读者走近沈从文提供某种进径和可能。对于精英读者而言,沈从文的价值,离不开他独特的文化取向;对于大众读者来说,沈从文的魅力,关联着他小学文凭而大学教授的神奇人生经历。而这两

者,如果离开了他作为一个杰出作家的超拔成就,终究都是空中楼阁;我们对沈从文生平的怀念评说,如果离开了对其作品的理解,其结果也只能是买椟还珠。所以,尽管“评说”的立足点更多的是“人”而不是“文”,但其最终目的还在于孟子所言的“知人论世”——为专业或非专业的读者更好的读解沈从文的作品提供一种可行的参照。

当然,区区几十篇文章、短短几十万字的篇幅,相对于沈从文所创造的皇皇三十二卷、多达一千万字的精神遗产,数量委实微薄,也远远未能达到还原一个完整、真实的沈从文的初衷。编者尽力所做的,只能是借助不同时期各位作者的哲思与体悟、慧心与妙笔,尽可能多侧面地揭示沈从文这样一个丰富独特的存在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的意义。

(《沈从文评说八十年》,王珺编,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2004年2月第1版)

手握高考金钥匙

□ 王极盛

高考是中国的第一大考,亦是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

上大学上名校仍然是目前中国广大学生与家长的愿望。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们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问题是怎样

实现这个愿望。什么事情都有规律,高考也一样的。高考成功的规律是什么呢?1996年以前,一些中学老师找我给学生做讲座,给学生分析怎样才能考得好。不少的家长与考生都向我咨询有

关高考的心态及学习方法问题,我都不能接受。因为我还不了解高考,也没有研究高考。要我讲的话,也只能从小事出发,那肯定都不到位,弄不好还会误人子弟。我曾经说过,一位心理学家,甚至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如果他并没有研究高考,而来谈高考,肯定还不如高三的班主任说得好。

1996年,我决心研究高考,



研究高考规律。1999年,国家启动高考改革,改革后的高考侧重考核学生的素质、考核学生的能力。我从1999年开始研究高考状元。状元是高考成功的佼佼者,他们能成为状元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从开始研究高考到2003年,我总共采访了300多位省级高考状元,分析、研究了他们成功的经验。研究状元的成功经验,绝对不是让学生都成为状元,而是让学生从这些分析和研究结果中,掌握高考的成功规律。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阳光状元路》一书,就是我在连续5年访谈与研究300多位状元的基

础上,以2003年高考状元的典型事例,探索高考成功的规律,总结高考成功经验。希望广大学生能从中掌握到这把“金钥匙”,开启成功的大门。

而另外一本《相约北大清华》,则是我用三年时间追踪研究学生、家长与老师的产物。在书中,他们谈了各自成功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怎样调整心态,怎样学好和考好理科综合,怎样帮助孩子调整心态,怎样做好学生的考前心理工作等等。如果说《阳光状元路》中的事例具有典型性和规律性,《相约北大清华》更具有

普遍性和个案性。两书相互印证,给读者揭示高考成功的规律,提供可行性的经验。

我并不想在这两本书中发表过多的学术性的言论。我力求在书中真实具体地反映高考的成功规律,强调其实用性、操作性和有效性。我更多地希望学生、家长和老师,能从中得到启发,掌握高考的成功规律,掌握高考的金钥匙。

(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相约北大清华》、《阳光状元路》两书的作者。两书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效益来自于质量与市场

□ 李 阳

与许春晓先生相识,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机。2001年8月,我们在同一趟北去的列车上,同一个车厢里,形成了中铺和下铺的关系。我们认识后,几乎没有停顿地连续交流,我站在编辑的角度,许先生站在作者与读者的角度,探讨了许多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在旅游专业书籍出版方面达成了共识:当前旅游科学界和实业界已经形成了对旅游理论书籍的特殊供求关系,时代呼唤有新意的旅游理论书籍的出版。

当然,许先生这一观点的形

成应该更早,而且也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在交谈中,他告诉我他已经完成了一本市场导向型旅游规划方面的新著的初稿,是一本总结16年旅游规划研究成果的著作,并向我介绍了大体内容。我觉得可以考虑列入出版选题,便约定以后面谈。

拜读许春晓先生所著的《旅游规划新论——市场导向型旅游规划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以下简称《旅游规划新论》)书稿后,感觉特别好,整部文稿形成规范,虽然是初稿,但作者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从

这种形式的表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仔细地阅读本书,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因为不得不参阅许多文献资料。读后形成的初步认识是:该书全面展示了作者对于市场导向型旅游规划的全新思考。全书新意迭出,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正如南开大学著名旅游学者申葆嘉教授1996年所指出的,旅游学界的理论研究是十分肤浅的,成果也是罕见的,过于重视应用研究和实证研究,忽视理